特色小镇建设对人口流出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以长官杂技小镇为例

毛翰臣[1]，杨开路[1*]

([1] 云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在我国中部人口持续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成为中部人口流出区破解发展困境、助力中部崛起的重要探索。选取位于中部黄淮平原腹地、具有典型人口流出特征的安徽省临泉县长官杂技文化小镇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系统探究特色小镇建设对镇域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发现：特色小镇建设主要通过重塑居民的文化感受、景观感受与人际感受三个维度体验共同影响地方感变化，其中人际互动体验的改善对积极地方感的形成作用最为直接显著;居民个体的时空对比机制是理解地方感变迁的核心内生调节变量。揭示了特色小镇建设在重塑地方感、促进‘人回流’与‘业振兴’协同方面的潜力与挑战，为中部人口流出区依托特色小镇建设激活内生动力、助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地方感；人口流出区；扎根理论；时空对比机制；长官镇杂技小镇

The Impact of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on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Population Outflow Areas: A Case Study of Changguan Acrobatics Town

Mao Hanchen[1], Yang Kailu[1*]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ersistent population outflow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in Central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for these outflow areas to overcom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nitiative. This study selects Changguan Acrobatic Culture Town in Linquan County, Anhui Province—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Huanghuai Plain in Central China and exhibiting typical population outflow characteristics—as a case study. Emplo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on the sense of place among town resid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primarily influences changes in the sense of place by collectively reshaping residents' experienc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perception,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erception. Among these, the improvement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plays the most direct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fostering a positive sense of place. The individual temporal-spatial comparativ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erves as the core endogenous moderating variable for understanding shifts in the sense of plac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in reshaping the sense of place and fostering synergy between "population return"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t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ctivating

基金项目：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项目《滇南云水——基于云南建水茶罐的新形态文创研究》(项目编号: S202310673203X)

作者简介：毛翰臣（2005-），男，天津，本科，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学

杨开路（1995-），男，安徽阜阳，硕士，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学

通讯作者：杨开路，lqhny@foxmail.co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through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in population outflow areas of Central China, thereby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strategy.
Keywords: Sense of place; Population outflow area; Grounded Theory; Temporal-spatial comparative mechanism; Changguan Acrobatic Town

引言

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其崛起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1]。然而，就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部地区面临显著的人口外流压力，尤其是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劳务输出规模巨大。城乡间劳动人口流动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社会现象之一[2]，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不仅导致中部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乡村“空心化”加剧、本地消费市场萎缩，更深层次地削弱了地方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形成“人才流失-发展乏力-吸引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成为制约中部崛起的关键瓶颈。在此背景下，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明确提出要“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并特别强调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3]。

特色小镇建设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挖掘地方特色资源、优化人居环境、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被中部各省寄予厚望，被视为破解人口流出困境、激活内生动力、服务中部崛起战略的关键举措之一。临泉县地处中部黄淮平原腹地，是典型的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在区域经济版图上处于双重边缘化地位[4]，长期存在资源分配边缘化、区域经济联动断裂的问题，呈现“农业主导、工业薄弱、服务业滞后”的特征，在中部众多农业县中具有普遍代表性。近年来，临泉县依托其悠久的“中国杂技之乡”文化底蕴，大力推进长官杂技文化特色小镇建设，旨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方发展与文化振兴。

地方感作为人文地理学核心概念，指人与特定地方间的情感联系与意义赋予[5]。其作为个体对特定地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体现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情感纽带，其意义日益凸显[6]。自段义孚引入“地方”概念并强调其情感属性与依附感以来[7,8]，其内涵不断深化与多维化：Cresswell 强调地方的社会文化建构性[9]；Shamai 关注人地关系的整体性[10]；Massey 提出“全球地方感”，突出了地方感的开放性与动态性[11]；Relph 将地方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无地方”和“非地方”[12]。国内学者如朱竑等[13,14]则延续段义孚的关于“地方”的定义，着重测度人民对地方的情感依附；李如铁等引入“消极地方感”概念，将疏远、厌恶等感官体验引入地方感研究[15]；楚晗等基于 Massey 的研究提出内向型与外向型地方感及其交互作用[16]，共同促进地方感成为一个包容、动态的概念[17]。

现有地方感研究多集中于地理学、传播学以及旅游学领域，跨学科应用广泛，关注人与地方的情感互动。在地理学研究中，主要研究地区变化和居民地方感变化的交互关系，谢涤湘等[18]探究生态保护区的和村民地方感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卢志霖等[19]探究行政区划调整对居民地方感建构机理。旅游学研究游客旅行中的目的地情感体验与认同如何影响其决策和行为。王泓砚[20]解释游客地方感与旅游场之间的关系,吴偲[21]探讨了艺术旅游与游客地方感的影响路径。在传播学中则侧重于关注基于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变革。如与欢等[22]探究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感生成逻辑；杨帆等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影响。

目前研究涉及主体多元，虽视角多元但存在局限：针对人口流出地，尤其是中部地区在特色小镇建设背景下居民地方感动态变化的研究尚显不足；对居民个体基于流动经历与生命历程所形成的内在参照系如何调节环境变化与地方感关系的探讨有待深化。因此，深入探究特色小镇建设对这类典型中部人口流出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不仅关乎单个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更对理解中部地区如何通过地方性实践重塑居民认同、增强本地吸引力、进而服务“人才回流”与“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的中部崛起核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选取安徽省临泉县长官杂技文化小镇为典型案例，借鉴李如铁等[15]的消极地方感概念与楚晗等[16]的内向/外向型地方感理论框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系统解析特色小镇建设如何通过多维感知体验影响镇域居民地方感，并着重探究个体化的“时空对比机制”在其中的核心调节作用。

1. 案例地和数据来源

1.1. 案例地概况

本文的案例地长官杂技小镇位于临泉县长官镇（图 1），临泉县是我国户籍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其二三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此外，临泉县素有“中国杂技之乡”的美誉，杂技艺术在此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遗存表明当地杂技活动可追溯至两千年前。近年来，临泉杂技影响力不断扩大。而长官镇则是临泉县内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之一，其区域内的长官杂技小镇项目总体规划用地面积为 148.65 亩，总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总投资 5.03 亿元。项目包括育才阁红色文化区、山陕会馆古文化区、杂技文化表演区、特色美食体验街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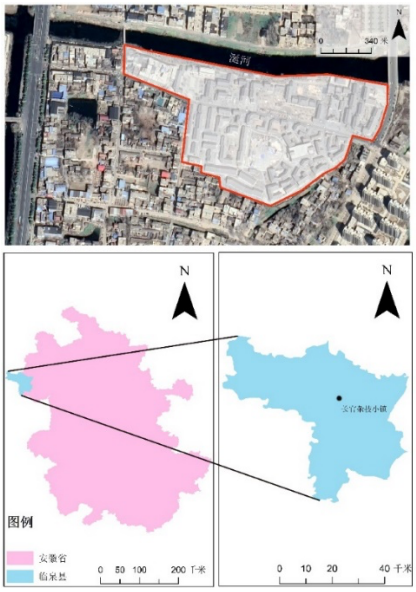

图 1 长官杂技小镇区位

1.2. 数据来源

表 1 长官杂技小镇访谈样本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特征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特征
K1	男	44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1	男	53	附近居民
K2	女	31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2	男	21	附近居民
K3	女	20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3	男	29	附近居民
K4	女	20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4	男	21	附近居民
J1	男	60	商贩	F5	男	29	附近居民
J2	男	38	商贩	F6	男	24	附近居民
J3	男	60	商贩	F7	男	47	附近居民
J4	男	60	商贩	F8	男	40	附近居民
J5	男	24	商贩	F9	男	47	附近居民
J6	男	52	商贩	F10	男	64	附近居民
J7	男	51	商贩	F11	女	44	附近居民
J8	男	56	商贩	F12	女	24	附近居民
J9	男	27	商贩	F13	女	23	附近居民
J10	女	18	商贩	F14	女	33	附近居民
J11	女	63	商贩	F15	女	20	附近居民
J12	女	29	商贩	F16	女	57	附近居民
J13	女	69	商贩	F17	女	24	附近居民
J14	女	53	商贩	F18	女	18	附近居民
J15	女	19	商贩	F19	女	57	附近居民
J16	女	63	商贩	F20	女	22	附近居民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资料收集等社会调查方法获取相关资料。在 2024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0 日为期约 1 个月的田野调查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访谈了 40 名受访者(表 1)，针对本文案例地的特点及研究问题，所选取的受访者均为在长官镇居住时间不少于 10 年的居民，他们见证了杂技小镇设立前后长官镇的发展演变。受访者男女比例为 1:1；年龄主体为 21-40 岁（19 人）和 31-60 岁（14 人），20 岁以下和 61 岁以上分别为 3 人和 4 人；包括 4 名杂技小镇工作人员、20 名居民、16 名集市商贩。每段访谈时长均在 20 分钟以上，转录文字材料达 9 万字。访谈内容包括其在杂技小镇设立前后景观变化、赶集体验以及地方情感的变化等。

2. 研究方法和过程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 1967 年由社会学家 Glaser 等[23]最先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允许在没有先验性假设和结论的情况下开放性地收集与分析资料，是质性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24]。区别于定量研究，质性方法注重对事物本质的微观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主要通过提炼概念，归纳范畴，挖掘范畴之间的关联，不断建构与修正理论。一些研究将扎根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多重对应分析等定量方法相结合，进行分析或验证[25,26]。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利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了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等[27]。参考上述研究以及谢涤湘等[18]的编码方法，本文的分析路径包括：开放式编码：采用深度访谈，抽象化、概念化反映杂技小镇设立对居民地方感影响的问题。主轴编码：不断比较概念，建立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使其具有指向性、逻辑性、理论性[28]。选择性编码：分析范畴之间关系后搭建核心模型。

2.1. 开放式编码

对访谈文稿的原始文本逐句阅读和分析，经过两次编码和多次修正后，最终提取出 438 个代码，然后进一步缩编，形成了 30 个概念。开放性编码形成的概念实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开放性编码形成的范畴示例

编号	原始语句	概念化	范畴提取
T1	搞了这个杂技小镇，赶集热闹多了，人咋恁多哎!	热闹	文化感受
T6	街头还搞了个大门，花篼嘞，真好看!	好看	景观感受
T22	咱这以往没盖（指街旁仿古建筑）之前集上没恁好看，盖了以后看着不赖。	好看	景观感受
…	…	…	…

2.2. 主轴编码

本阶段对开放性编码中相互独立的范畴进一步归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回到案例地现场，进行持续性地分析和比较，最终确定主轴编码[29]。主轴编码结果显示，上一步所形成的范畴可归纳为文化感受、景观感受、购物感受、娱乐感受、交际体验和地方感(图 2)。访谈发现，设立特色小镇对居民文化感受、景观感受和交际体验的影响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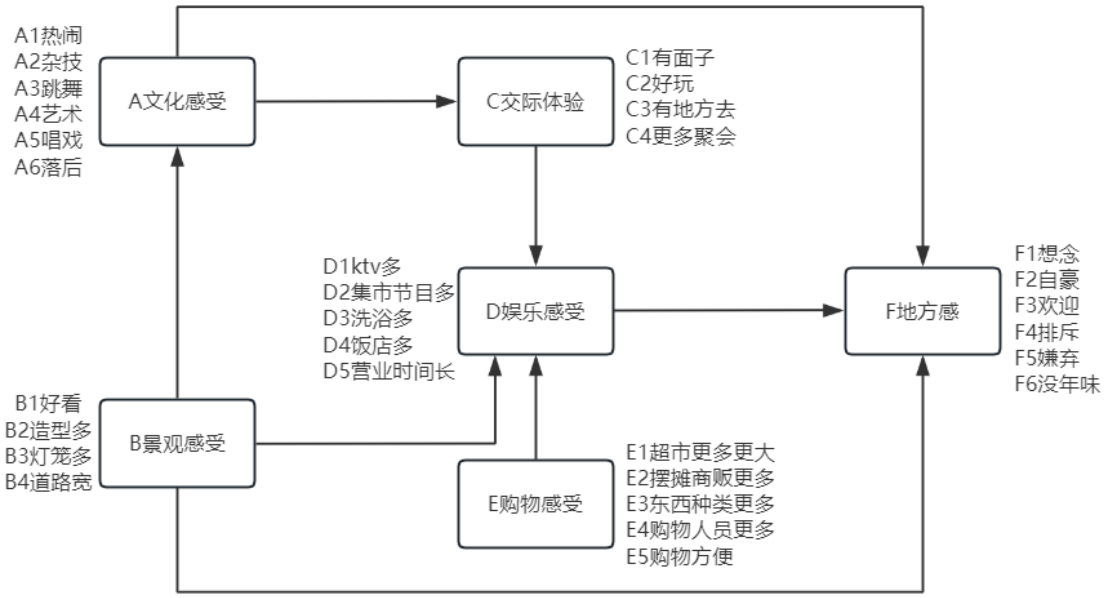

图 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所发现的概念类属中选择核心类属概念，通过不断地分析，将与之相关的次要类属概念集中起来，以系统地说明和验证主要类属概念与次要类属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填充未来需要完善的类属概念的过程[30]。分析主、副范畴后发现，杂技小镇的设立促使当地文化感受、景观感受、购物感受以及娱乐感受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文化体验、景观视觉体验和购物体验，并进而影响居民的地方感(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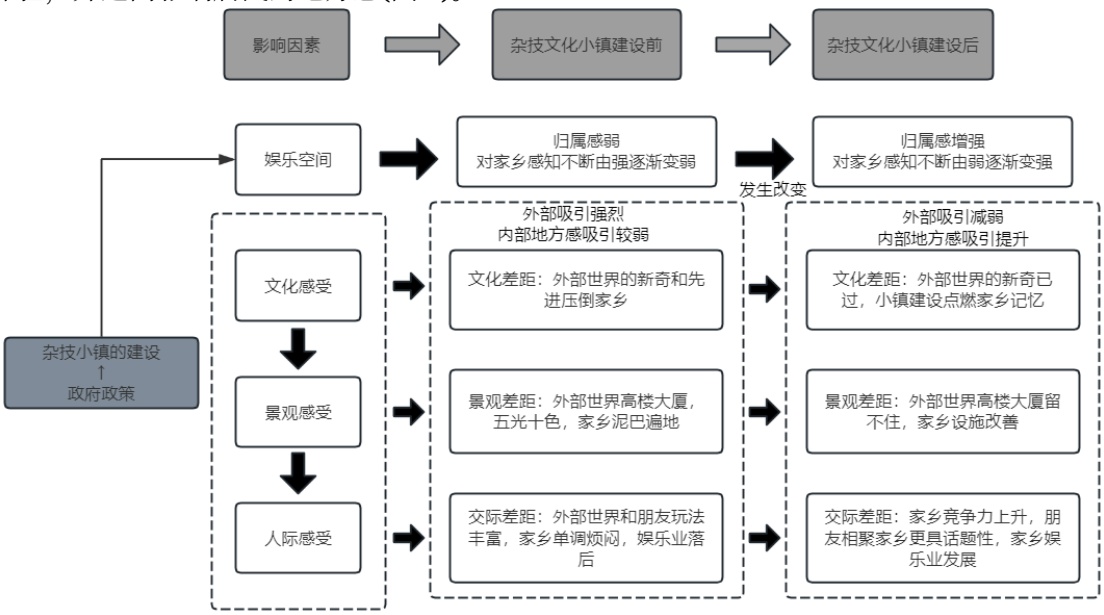

图 3 居民地方感变化分析

3. 结果分析

基于选择性编码的分析发现，杂技文化小镇的建设虽改善了镇中心基础设施，但受限于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乃至省内较发达区域长期存在的显著发展差距，其变化规模对居民而言相对有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规模务工群体将长三角核心区的繁华景象作为重要参照系，显著提高了其对家乡变化的感知阈值。这使得小镇的局部改善难以达到其心理预期的“震撼”程度，进而导致居民对设施升级的整体感知趋于平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正都是这样，看起来花里胡哨的，有没有多大让长官发展起来”(J4)；“(建筑样式)比以前肯定强些，毕竟用房子啥的都搞的不赖，但是

我觉得没啥大变化, 我天天搁这摆摊, 都看习惯了”(J6);“亳州的也有杂技小镇, 都差不多嘛”(F4)。除了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感知阻断外, 拆迁原油房屋也引起一部分拆迁居民的不满, “按理说搞哩不赖, 但是没有想的那么好, (街道建筑) 外观上看着好看, 里面还是那样, 换汤不换药”(F2)。因此, 杂技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较少直接地影响当地居民地方感的变化, 更多的是通过对居民赶集时获得的文化氛围、娱乐感受和赶集体验的改变而影响居民的地方感。

3.1. 居民地方感变化主要原因

3.1.1. 文化感受的重塑

小镇通过常态化杂技表演、技艺传承活动及文化展示, 使一度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边缘化的传统杂技文化重新获得关注和重视。这促使居民重新认识并珍视其文化根源, 激发了对地方传统的自豪感, 如: “过去……好多年了, 这儿的小伙子不上学了都去学杂技……, 文化还是有用哩, 长官就靠杂技小镇宣传起来了”(K1)。这种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肯定, 是地方认同感的核心组成部分。

小镇不仅提供观赏性表演, 更引入了手工艺体验、互动展览等项目。居民从被动观察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通过沉浸式体验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内涵。这种参与式文化实践增强了文化亲近感和主人翁意识, 丰富了地方依恋 (的情感维度。此外, 以现代方式呈现传统, 也为年轻居民提供了接触和理解本地文化的新渠道, 有助于弥合代际文化认知差距, 为地方感的代际传承注入活力。

因此小镇也随之成为本地居民共同的文化活动中心和话题来源。居民在参与活动、交流体验的过程中, 共享文化记忆, 强化了基于共同文化遗产的社区纽带。这种基于地方性文化的社会互动, 促进了社区归属感, 进一步巩固了地方感的社会基础。

3.1.2. 景观环境的再造

古风景观的引入美化了原本可能单调或杂乱的镇区环境, 如 F1 描述: “房子都跟庙一样, 还挂上了各种颜色的灯, 晚上可好看”。这种视觉愉悦感和审美认同, 直接提升了居民对所处物理环境的满意度, 是地方满意度的重要方面。仿古建筑和特色景观成为长官镇新的、鲜明的视觉标识=。它们作为杂技文化的物质象征, 将抽象的文化传统具象化、空间化, 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直观感受到地方特色的彰显, 强化了地方独特感。

改造后的街道和广场更具吸引力, 成为居民日常散步、聚集、闲聊的场所。环境品质的提升激活了公共空间的使用, 间接促进了非正式的社会交往, 为人际感受的变化提供了空间支持。同时, 古风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居民对历史和地方传统的联想, 有助于联结当下空间与集体记忆, 增强地方的连续性与深度感。

3.1.3. 人际网络的活化

小镇的建设及随之而来的集市繁荣、活动增多, 显著提升了本地的社交吸引力和活力。居民不再需要远赴外地聚会。朋友邻里更频繁地在本地相聚、交流, 谈论家乡新变化, 这种本地化社交的回归与活跃极大增强了居民的社区融入感和“在地方”的归属感, 是积极地方感最直接的体现。

杂技小镇成为家乡的“新名片”和共同的骄傲源泉。居民在对外介绍或内部交流时, 拥有了值得谈论的“地方亮点”。如: “过去都说咱这落后, 现在大不一样, 都发展起来了……”(F6)。这种共享的地方话题提升了居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尤其是在与外地亲友或他乡比较时。

小镇带动的集市、商铺等商业、旅游和服务业发展, 创造了更多本地就业和创业机会。尤其是部分原可能外出务工的居民有了在本地谋生和发展的可能, 经济上的在地化显著增强了其扎根家乡、建设家乡的意愿和信心, 是地方依赖的重要基础。

随着本地文化活动的兴盛, 居民娱乐、休闲选择丰富, 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缓解, 居民有更多时间和意愿在家乡陪伴家人, 享受家庭生活。家庭作为最核心的初级社会群体, 其活动空间向本地的回归, 深刻强化了基于亲情纽带的地方依恋。

3.2. 地方感变化的调节机制——时空对比视角

特色小镇建设带来的物质与文化环境变化并非直接、均质地转化为居民的地方感。居民个体基于自身生命历程和空间流动经验进行的时空对比, 构成理解其地方感变迁的关键调节机制。这种对比的核心在于居民评估当下家乡状态时, 所参照的内在标尺, 即其对过往家乡的记忆、对外

部世界的认知以及对社交网络的依恋程度，由此产生“相对获得感”或“相对失去感”，进而形塑积极或消极的地方感。

从时间维度对比而言，居民将当前家乡环境、生活条件、文化氛围与自身记忆中的过往进行纵向比较。若感知到显著改善，如收入提高、环境美化、文化活力增强，则易产生满足、自豪等积极情感。若感知到某些珍贵元素的消逝或未达预期，如传统氛围淡化、社区关系疏远，则易产生失落、怀旧等消极情感，如 F13 所言：“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家里年味足……现在过年都没有年味了……”。这种“失去”往往关联着对传统连续性或集体记忆载体减弱的忧虑。

空间维度的对比主要基于大规模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尤其是务工群体的居民将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作为强大的外部参照系。发达地区的繁华景象显著提高了其对家乡变化的心理预期和“震撼”阈值。小镇局部的、渐进式的改善（，在与“他者”的横向对比中，可能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强化了“相对滞后”的认知，如受访者 J4, J6, F4 对变化“平淡”的感知。这是消极地方感的重要来源。另外，社交圈主要在本地、家庭依恋深厚的居民，更容易聚焦于本地的积极变化，产生相对获得感。相反，长期在外、家乡社交网络薄弱的居民，更易受外部参照系影响，对家乡的“不足”更为敏感，产生相对失去感。

此外，对家乡亲人的情感依恋强度是时空对比中一个稳定的情感参照点。深厚的家庭纽带往往能缓冲外部对比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对家乡积极变化的地方依恋。反之，家庭纽带弱化则可能放大相对失去感。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中部人口流出区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如何通过地方建设重塑居民地方感以增强本地吸引力、服务人才与产业回流，以临泉长官杂技文化小镇为典型案例，揭示了特色小镇建设影响居民地方感的多维路径及其核心调节机制——“时空对比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特色小镇建设通过重塑居民的文化感受、景观感受与人际感受三个维度的体验共同重塑地方感，三者相互交织。其中，人际互动体验的改善对积极地方感的形成作用最为直接和显著，其效应超越了文化和景观环境的改善。这凸显了在人口流失背景下，重建富有活力的本地社会联结与人际互动是重新锚定居民地方归属感、激发“留乡”或“返乡”意愿的更强劲引擎。（2）“时空对比机制”是理解地方感变迁的关键内生变量。 居民地方感的变化不仅源于外部环境改变，更深刻受制于其个体化的“时空对比机制”。时间维度上居民将当下家乡与过往记忆进行对比，产生相对获得感或相对失去感。空间维度上居民基于外出务工经历，将家乡现状与发达地区进行对比（J4, J6, F4）。大规模务工群体带回的外部见闻，使得他们对家乡“小规模”变化的感知阈值提高，对设施改善的震撼感减弱，甚至产生“相对滞后感”。情感维度中对家乡亲人的依恋强度变化，以及本地社交网络的稳固程度，深刻影响对比结果。个体的过往经历、家庭情感依恋及外部参照系共同构成了地方感评价的内在标尺，积极地方感（与消极地方感常在此对比中并存甚至相互消解。这一机制深刻揭示了中部人口流出区居民在评估家乡变化时面临的独特心理逻辑——交织着对“过往家乡”的记忆、对“发达他者”的认知以及对“家庭情感”的依恋。积极地方感与消极地方感常在此复杂的时空情感坐标中并存甚至相互消解。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1）揭示了中部人口流出区特色小镇建设影响地方感的特殊路径与核心价值。区别于一般旅游或商业开发，面向人口流出地的文化特色小镇建设，其核心价值在不仅在于硬件改善与文化展示，更在于通过激活本地人际网络、创造在地化互动机会来重建社区归属感与社会凝聚力。这对于资源相对有限的中部地区优化特色小镇建设重点——从“造景”转向“聚人”、从“硬件投入”转向“社会资本培育”——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是服务中部崛起“人才回流”与“本地产业培育”目标的关键。（2）提出并验证了“时空对比机制”的核心作用，为理解中部居民地方感复杂性提供了精细理论透镜。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居民个体生活史、空间流动经验及家庭情感依恋整合为“时空对比机制”，强调其对地方感形成与变迁的内生性、动态性影响。特别是揭示了外部发达地区作为强参照系对居民感知阈值和心理预期的深刻塑造作用，这为中部地区制定特色小镇宣传策略、设定合理发展预期和弥合“官方叙事”与“民间感知”的鸿沟，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依据。同时，机制中对时间维度和情感维度的关注，也提示中部地区在建设中需注重保护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与元素，并重视家庭作为地方情感核心锚点的作用。（3）为中部人口流出区依托特色小镇建设助力崛起提供实践启示。基于研究发现，特色小镇建设要深耕“人际土壤”，

服务“人回流”与“业振兴”，促进本地社群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作为核心目标之一。积极组织基于本地文化的社群活动、搭建返乡青年与留守居民的交流平台、支持本地化的小微商业与社交空间。这不仅能提升地方感，更是营造“留得住”的社会环境，为返乡创业就业提供社会网络支持，直接服务于中部崛起所需的“人才回流”和“本地产业培育”。还应正视“时空对比”，实施包容性策略。理解并尊重居民基于自身经历的多元感知。避免过度宣传“翻天覆地”，注重渐进式、有温度的更新，保留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与元素。针对务工群体，可建立信息桥梁，使其更深入理解家乡变化的细节与意义，并探索为其返乡创业、参与本地事务创造便利。更要持续运营与文化活化，铸牢“文化自信”。确保特色小镇“软件”内涵的持续挖掘与维护，定期推出高质量、参与性强的文化活动，让文化体验真正融入居民生活，而非仅服务于游客。这将巩固地方文化作为认同核心符号的地位，培育具有中部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和居民自豪感，直接服务于中部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建设。

总之，在服务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宏大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对地方感的影响远非简单的环境改造工程，而是一个涉及地方认同重塑、社会网络激活、个体心理调适的复杂社会过程。对于中部人口流出区而言，能否有效利用特色小镇这一载体，关键在于能否深刻理解并积极引导居民的“时空对比”逻辑，能否将建设重心从物质空间转向社会空间与情感空间的培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以特色小镇凝聚人心、以地方认同吸引人才、以人才与产业协同激活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中部崛起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程必定,陈耀,秦尊文,等.新时代站在更高起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J].区域经济评论,2024,(04):5-20.

[2] 张广胜,韩雪.进城务工人口职业流动的实证性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4,(05):45-55.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部崛起战略与对策[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封凯栋,刘星圻,陈俊廷,等.行政边界对振兴连片特困区的影响：区域增长极扩散效应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2,(02):65-73.

[5] EYLES J .Senses of place[M]. London: Pion,1985.

[6] KYLE 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place[J].Leisure Science,2007,29: 209-225.

[7] TYAN, Y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6-8

[8] 段义孚,志丞,左一鸥.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J].地理科学进展,2006,25(2):1-7

[9] CRESSWELL T .Place:An introduction[M].Hoboken: JohnWiley&Sons, 2014.

[10] SHAMAI S .Sense of place:An empirical measurement[J]. Geoforum ,1991,22(3):347-358.

[11] MASSEY D B .Space,place,and gender[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146-173.

[12]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Pion, 1976.

[13] 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3(1):1-8.

[14] 谢涤湘,常江,朱雪梅,等.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地方感特征:以广州荔枝湾涌为例[J].热带地理, 2014,34(4):482-488.

[15] 李如铁,朱竑,唐蕾.城乡迁移背景下“消极”地方感研究:以广州市棠下村为例[J].人文地理,2017,32(3):27-35.

[16] 楚晗,谢涤湘,常江.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关系研究: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人文地理, 2019,34(4):54-62,72.

[17] 郑昌辉.在城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地方感:概念与研究进展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 2020,27(5):116-124.

[18] 谢涤湘,简慧敏,楚晗.生态保护区设立对周边村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 2023,42(12):2401-2413.

[19] 卢志霖,殷冠文,罗存菁,等.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的居民地方感建构——以济南莱芜合并为例[J].人文地理, 2025,40(01):45-52.

[20] 王泓砚,谢彦君,王俊亮.凝视性景观与互动性景观——旅游场景观类型对游客地方感的结构性影响[J].旅游学刊, 2021,36(11):80-94.

[21] 吴偲,朱竑,李军.艺术旅游与地方感的相互关系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群组为例[J].旅游学刊, 2022,37(04):116-127.

[22] 余欢.从在地到在线：非遗的媒介化呈现与地方感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64(02):129-138.
[23]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Aldine Pub, 1967:18-48.
[24] 吕蕊,石培基,聂晓英,等.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J].地理科学, 2017,37(5):718-727.
[25] 王腾飞,马仁锋.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1):1567-1580.
[26] 仇梦嫄,张捷,杨加猛.新健康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多维康复景观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研究:以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927-943.
[27] 黄坤,吴文恒,杨毕红,等.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J].热带地理, 2022, 42(5):751-761.
[28] FASSINGER R E .Paradigms, praxis, problems, and promise:Grounded theor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5, 52(2):156-166.
[29]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 18(4):58-63, 73.
[30] 陶伟,王绍续,朱竑.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J].地理研究,2015,34(06):1173-1187.